

张丽军 著

对话与争鸣

主编：王光东、吴义勤

新世纪批评文丛

—— 新世纪文学文化热点问题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批评文丛

主编：王光东 吴义勤



对话与争鸣

——新世纪文学文化热点问题研究

张丽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与争鸣/张丽军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8

(新世纪批评文丛/王光东, 吴义勤主编)

ISBN 978-7-81118-483-9

I. 对... II. 张...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 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663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刘 永

装帧设计 庞遵云

对话与争鸣

张丽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250 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81118-483-9/I·102 定价: 27.50 元



第一辑 新世纪“三农问题”与文学研究 ■■

百年乡村时空里的“阿 Q” ■2■

文学何以走向农民 ■15■

——赵树理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25■

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 ■39■

——读贾平凹的《秦腔》与《高兴》

回归“仁义”传统，抑或另建“生活伦理”？ ■51■

——周习《土窑》小说的伦理叙事解读

翻身欢歌中的“一声叹息” ■62■

——孔厥《受苦人》女性农民形象的主体意识

从经济翻身到精神翻身、人性解放 ■68■

——解放区文学中翻身农民的复杂心态、多元诉求与当代反思

第二辑 关于新世纪文学与时代精神状况的对话 181

《士兵突击》与时代精神状况研讨 182

《红灯记》电视剧与新世纪红色文化重构 108

关于第七届“茅奖”作品《秦腔》的研讨 120

新世纪长篇小说：多声部、创新难度以及重寻大师的可能 138

问询孤独的精神生命 158

——读《我心彷徨——徐訏传》

从鲁迅、王小波到当代文化现象：本土化现代性思想的
建构与评判 113

——读房伟的《批评的表情》

穿越时空的精神会晤 171

——解读刘雨先生的《多元矛盾中的个性选择》

通往诗意栖居的艺术之桥 178

——评刘坤媛教授的《艺术：诗意地栖居》

第三辑 新世纪文学与文化现象争鸣 177

“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 178

——关于茅盾文学奖“无边的质疑”的深层探寻

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 192

——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

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 201

——兼与摩罗先生商榷

“消费时代的儿子” 212

——对余华《兄弟》“上海复旦声音”的批评

被“异化”的生命形态 227

——对沈石溪小说动物形象及其审美情感心理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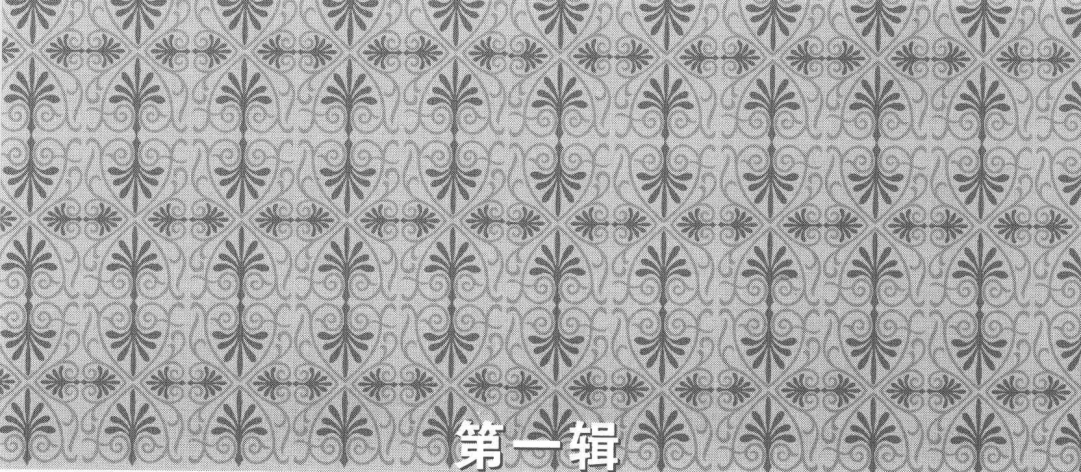
附录 233

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 233

摩罗：中国现代小说的基因缺陷与当下困境 245

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 253

后记 279



第一辑

新世纪“三农问题”与文学研究

百年乡村时空里的“阿 Q”



[摘要] 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距视角,来观照《阿 Q 正传》所展现的未庄世界,也许更能显示出鲁迅《阿 Q 正传》的思想价值和未庄所代表的乡村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及农民自身主体性建立的艰难过程。该文通过解读 20 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典型作品,把阿 Q 与 40 年代赵树理《李有才板话》、80 年代何士光《乡场上》、90 年代阎连科《乡间故事》中的农民进行对比性分析,探索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展现中国农民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变迁和形象演变。

[关键词] 《阿 Q 正传》;阿 Q;乡土文学;中国农民;无物之阵

农村与农民是 20 世纪中国关注的中心问题,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以其“国民性改造”系列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批判性创作主题,奠定了乡土文学的美学品格。《阿 Q 正传》中的农民阿 Q 和他所在的未庄,成为愚昧农民、落后农村的重要代表。在以往的《阿 Q 正传》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把批判的目光集中于“阿 Q”身上,而对阿 Q 所在的未庄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分析不够。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远视角,结合新时期文学来观照《阿 Q 正传》所展现的未庄世界,也许更能显示出鲁迅《阿 Q 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未庄所代表的乡村世界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及农民自身主体性建立的艰难过程。

因此,本文把阿Q及其未庄世界放在20世纪文学场域中,与40年代《李有才板话》、80年代乡土文学《乡场上》、90年代乡土文学《乡间故事》进行对比性分析解读,充分显现《阿Q正传》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力量与乡间世界对农民现代主体性建立的压抑性力量。尤其是,揭示出在1949年新中国确立了新的、正义性的乡间秩序后,中国农民现代性转化仍然受到乡村时空里的“无物之阵”的压抑,仍然受到自身非现代性思想的阻力。

一、阿Q: 未庄世界压抑性黑暗力量的受害者

以往的研究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倾注了过多的目光,但对于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缺少更多的分析。要进一步认清阿Q的形象的思想内涵,就必须对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里的其他人物形象、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作品整体不是由一个形象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形象构成的,发现每个形象都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是总体的一部分。作品已经不是形象的结构,而是形象的组合,是许多形象的总和。这些各种各样的形象表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形象的体系。……所有人物性格都是一种社会生活现象,身边必然伴随有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固定陪伴。因此形象性格的刻画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伴随人物,涉及到通过社会共生关系与主人公发生联系、属于同一社交圈的其他性格。这些性格在形象体系中与独立存在的性格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存在只是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中心性格的本质。”^[1]因此,应该把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闲人、吴妈等形象与阿Q的形象结合起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内涵,也才能真正体会到阿Q悲剧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价值!

阿Q原本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2]雇工的身份本来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适当的生存权和自我尊严,但是未庄世界里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黑暗力量

却不断蚕食、剥夺他的生存权和个人生命尊严。这种压迫首先来自于未庄上层人物赵太爷。阿 Q 因为说他姓赵，和赵太爷是 본家，而遭到赵太爷的掌嘴巴的痛斥：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起来，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3]

阿 Q 就是因为穷而被剥夺了姓赵的人身权利，而且还要受到人身侮辱。但是，在这个未庄一手遮天的人物面前，阿 Q 只得无声退下。本来“很自尊”的阿 Q 不仅受到来自上层人物欺压，而且也遭到未庄闲人们的侮辱。

闲人们以阿 Q 的癞疮疤戏弄阿 Q，阿 Q 便以“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获得心理平衡。当阿 Q 说出要和吴妈“困觉”时，无形的未庄封建文化不仅使阿 Q 受到赵秀才的暴打、地保的勒索，而且连所有的未庄女人都视阿 Q 为异端躲起来，更严重的问题是：

“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

这大大危及了阿 Q 的生计问题。阿 Q 后来所幻想的改变命运的“革命”，也被假洋鬼子所垄断。为生存所迫的阿 Q 无奈进城而沦为盗贼，最终因此而被砍头。

从未庄世界里的其他人物与阿 Q 的关系、他们对阿 Q 的物质与精神的压迫就可以发现，阿 Q 所生存的乡间世界里的黑暗力量彻底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和他仅有的生命尊严。所以，阿 Q 的悲剧不仅仅在于“精神胜利法”缺点，还在于以赵太爷为代表的上层人物对他的迫害、未庄闲人对他的精神打击和人格侮辱、未庄女人对他的嫌恶、王胡小 D 们对他的蔑视、无形的封建性文化势力等构成的对阿 Q 进行压迫的有形与无形的多重体系的压抑性乡村结构。

在形象组合的人物世界中,我们还应看到,阿Q与王胡、小D等乡村弱势群体的关系上,阿Q对与自身等同境遇的弱势群体,不是同情、互助,恰恰相反的是,表现出蔑视、厌恶、对立、欺压。阿Q也具有未庄恶人们“以强凌弱”的特点(他自己就遭受过这样的欺侮),欺侮过与他相似的王胡、小D们。阿Q在某一时刻,也曾成为欺压他的黑暗力量中的一员,成为“吃人”群族的一员。阿Q的悲剧也有着深刻的自身内在思想根源。

由此,可以体会到鲁迅先生创造的阿Q形象所具有的更深刻悲剧所在,感受到阿Q所生存的未庄世界的可怕的、多重的压抑性黑暗力量。

二、革命翻身后的“阿Q”:蜕变的 压迫者与顺民奴隶

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对赵树理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赵树理还把鲁迅的《阿Q正传》带到家乡,读给父亲听,向借此启蒙农民。后来,赵树理独创性地转向民间文艺资源,来创作通俗易懂的农民文学,但是其思想内核依然是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解放后,对于农村出现的新压迫势力,赵树理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赵树理认识到解放后的农村封建思想文化依然浓重,依然笼罩在农民的心头,而且农村村级政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贫苦农民的手中,地主、富农在农村里的势力虽然有所削弱,他们也在寻找机会重新掌权。

比较《小二黑结婚》表现出的明快、喜悦、大团圆的乡村斗争结局,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对农民翻身解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展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也描写了翻身之后奴性思想依然存在的“阿Q”——老秦,而且对翻身之后的农村新压迫势力——旧地主的代言人与蜕化变质的新革命干部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式的叙述,还刻画了一个革命成功后居于乡村领导地位的“阿Q”——陈小元形象,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生动地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剥削之心不死的旧地主阎恒元、新的革命政权的代表者老杨同志、农村里的新干部的蜕化变质、忠厚老实的封建旧思想的农民老秦以及农村里的年轻气盛的青年农民，这些不同的乡村力量构成了新乡村力量的博弈。其中，老杨同志、章工作员是外来的革命者；阎恒元、阎喜富、刘广聚等人是乡村里的压迫者，老秦、小明、小保等农民是乡村被压迫者，小元是蜕化变质的新乡村干部。正是在乡村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斗争中，小说展现出了人物的丰富、鲜明性格特征，也体现了赵树理对农村、农民深刻的理解力。

阎恒元是阎家山反动剥削势力的头目，为人阴险，狡猾奸诈，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剥削压榨贫苦农民。村庄里进行改选的时候，阎恒元暗中吩咐人，选自己的干儿子刘广聚当了村长，他也继续得以横行村里，把编排板话揭示他虚伪、奸诈鬼脸的李有才赶出阎家山，让不服气的小元离开村庄去受训。小元受训之后，县里叫他回来成立武委会，发动民兵，跟村长是一文一武，独立于村公所；并且要村长给武委会准备一切应用物件。阎恒元十分后悔，皱着眉头就想了一招：

“既然错了，就以错上来——以后把他团弄住，叫他也变成咱的人！”广聚道：“那家伙有那么一股扭劲，恐怕团弄不住吧！”恒元道：“你不懂！这只能慢慢来！咱们都捧他的场，叫他多占点小便宜，‘习惯成自然’，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惯了。”^[4]

广聚领会了阎恒元的旨意，慢慢就生出法子来。比方广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没有，住在一个庙里觉着有点比配不上，广聚使用公款为小元做新制服；广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来割了一回柴，觉着不好意思。阎恒元、刘广聚就利用封建传统思想中的等级观念、蔑视劳动的思想，一点点地灌输、一次次地给小元好处，结果就把小元“团弄”过去了。小元果然变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

小元是阎家山贫苦农民的斗争代表。在成为武委会主任之初,他还保持着与地主反动势力斗争的革命品质,但是,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小元身上的贫苦农民的革命品质渐渐丢失,原有的封建等级差别观念也渐渐清晰起来,在地主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剥削思想的侵蚀下,蜕化变质,成为农村反动势力的同伙。蜕化变质的农民干部小元形象是赵树理对农村解放后的政治生态变化的一种新反映,不仅展现了赵树理的敏锐思想意识,而且也展示了赵树理反映农村复杂现象的胆识与勇气。

翻身后的农村新干部如何保持革命本性和为穷苦农民服务的本色、拒绝地主阶级的物质引诱、消除头脑中的封建剥削意识,是解放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个初期的、重要的任务与挑战。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就对农民革命者阿Q的革命心理、动机进行过描述,展现了农民头脑中的陈腐、落后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思想——对“子女、玉帛、威权”的追求、对“主子”地位羡慕追逐的奴才意识。在革命后农民翻身解放的解放区,“阿Q”式的封建剥削思想的幽魂依然还在翻身农民心灵中游荡。《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正典都是蜕化变质的新农民干部,是翻身革命时代的“阿Q”。

如果说小元是参加翻身革命、依然具有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阿Q”的话,那么,老秦就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因循守旧、安于本分的“顺民”奴隶。

老秦在《李有才板话》所展现的新农村政治生态环境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是,赵树理给予了老秦众多的话语言说机会,这其中表达了赵树理对老秦这一类型的农民形象的重视,老秦虽然是不起眼的顺民奴隶,但是众多的“老秦”却构成了阎家山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是革命的新农村政权争取、教育的主体。老秦是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农民形象。

老秦不仅有着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思想,而且还有着较为严重的封建等级观念,既害怕地主势力,又看不起与自己一样处境的穷苦人。但是,老秦看到阎恒元等人在老杨同志那里碰了钉子的时候,又对老杨

恭敬起来。最终老杨同志带领农民打败了地主阎恒元为首的反动势力,路过老秦门口的时候,老秦冷不防出来拦住老杨同志一行人,跪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头,称老杨为“救命恩人”,还要让他们到家里吃饭,老杨同志批评了老秦的落后心理,让他积极参加农救会。但是,从老秦磕头谢恩的言语、行为来看,农民老秦还是没有脱去旧的封建“青天大老爷”的思想,老杨对他的劝告、建议他还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还是没有觉悟起来。

仅仅从翻身斗争的行动表面和制度建设看,新农村里的政治生态已经得到了优化,旧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已经被清除出去,蜕变的新农干部已经受到了处罚,新的穷苦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及其组织——农救会重新成立了。但是,清除农民头脑中的封建思想的精神启蒙工作才刚刚开始,像老秦那样的深受封建旧思想侵蚀的“顺民奴隶”,他们的自我主体性的现代思想意识的真正觉醒、确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要做很多的思想启蒙工作。

三、冯么爸：抗拒“乡场上” 压抑性力量的觉醒者

《乡场上》是贵州乡土作家何士光的著名作品,发表于1980年第8期《人民文学》。何士光继承了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改造”启蒙思想意识,塑造了一个生活在新时期的“阿Q”形象,即乡村世界中破产了的、精神麻木的农民冯么爸。这个新时期的“阿Q”在新的乡村经济变动中,由原本贫穷、麻木的没有任何一点人格尊严的形象在一场乡村冲突中开始走向觉醒。

在乡场上,“冯么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5]就是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农民却被置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他为乡场上争吵的

罗二娘和任老大做个见证(罗二娘的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任老大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民办教师,与罗家无法相比)。

我们同样运用形象组合的原理,分析冯么爸的形象。即从冯么爸与梨花屯乡村世界里的各种不同层次人物形象的关系中,考察中心人物形象的本质内涵,揭示农民生存困难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根源。

梨花屯乡场世界中的上层人物罗二娘、曹支书、商店老板都以一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心理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组成了梨花屯这一乡村世界沉重的黑暗力量,压抑着冯么爸这样众多的穷苦乡民。在乡场上生活的冯么爸知道:

“你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不敬。你得罪了她罗二娘一家,也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瞧,我们这个乡场,是这样的狭小,偏僻,边远,四下里是漠漠的水田,不远的地方就横着大山青黛的脊梁,但对于我们梨花屯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仿佛就是整个人世。……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用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不,这小小的乡场,好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好多叫你意想不到,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那么,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你又怎样呢……”^[6]

在原先的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冯么爸又没有其他生存方式的选择,只好无奈地屈服于这一黑暗力量的压抑,不得不向罗二娘、曹支书低声下气地乞食、做“奴隶”。这同样印证了没有生存权的人就难有生命尊严而言的真理。正是这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冯么爸的穷困,经济上的困境又形成了对冯么爸生命尊严与人格的压迫,使他在乡村政治结构中沉默哑言。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的兴起,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被多元的、混合的经济打破,农民的生存空间、生存维度日趋多元化。原先与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密切相连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逐渐瓦解。因此,新时期的“阿 Q”——冯么爸拥有了原先阿 Q 所不具有的新的多元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在这种狭窄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的同时,冯么爸的生存方式就有了多元化可能,就可以发挥出被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压抑的多样才能,他可以“做活路”,可以凭个人劳动独立地获得生存经济权(是“个人”的、不再是附属于集体的劳动,是“独立”的生存经济权而不是“依附”性的生存经济权),所以,这位新时期的“阿 Q”就可以大声地喊出: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么爸今年不要也照样活下去!”^[7]

经济上已经独立,不再依附于梨花屯上层施舍的冯么爸在获得生存权的同时,其人格主体独立性也一点点觉醒起来:原本沉默失语的他,发出了生命觉醒的声音:“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声,我今天就不答应!”^[8]而且,勇敢无畏地为任老大家的娃儿的清白无辜做了见证。

冯么爸在从沉默失语到发出生命觉醒的声音,从原先的奴性回归到生命主体性,最大的根源就在于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使他获得了独立的多元经济来源,有了独立的、不再依附于他者的生存保障权。

何士光的《乡场上》鲜明地凸现了时代变革中乡村世界农民个性人格走向独立自主的觉醒过程,但同时也展现了乡村世界中依然存在的巨大的黑暗压抑力量。这一黑暗势力从鲁迅《阿 Q 正传》就描绘的“未庄”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未庄”的影子还闪现于 80 年代乡村世界之中。

冯么爸是不是真的凭借个人获得的独立生存保障就能够打破乡村世界的黑暗势力的压抑,真的能走向人格独立?这依然是一个问题。90 年代乡土文学作家阎连科的《乡间故事》证明了这一点。

四、连科·三姑女：市场经济 时代被异化的单面人

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世界中的农民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方式和更多的选择。乡村世界中原有的单一狭窄的经济结构被彻底打破，但是乡村世界中压抑性的上层势力并没有随之解体，而以一种更加紧密的形式把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及宗法道德势力结合在一起，如顽症般存在乡村世界中。

阎连科在90年代以《乡间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世界上层势力的新的存在方式，揭示出90年代乡村世界中的新政治经济结构所具有的某种压抑性力量。这种压抑性力量对普通贫苦的农民压迫，仍然一如20年代鲁迅先生所描绘的“未庄”一样，不同的只是招牌与时间的变迁。

“乡间俗市外人不明白，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各有其皇道，各有其民俗。如婚嫁：支书家大姑女是队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小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接续起来，村委委员、治保主任、妇女主任、民事纠纷调解员、村委会会计、生产组长、税代员、信贷员、村中电工、水利组长、面粉加工厂厂长、铁钉厂经理、手纸厂领导、老中医、新西医、民办教师……红红绿绿、上上下下、都扎扎实实是亲戚。没办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乡间就是这物景、这面貌。”^[9]

从鲁迅先生所展现的“未庄”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乡村世界的上层势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织了一张威力无比、巨大无边的网，生存其中的农民无不时时刻刻亲身感受到它的存在。

如果说冯幺爸以前的时代，乡村世界的上层势力是凭借其经济优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控制权而使无法维持生存保障的农民依附于他们；冯幺爸以后的新时期中，社会经济变革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生存渠道和生存